

計畫申請年度：2018-1 期
計畫名稱：「重返南方」報導寫作計畫

申請人：林怡廷

序幕：兩個核心和兩個邊陲的無聲之戰

前言：

香港危機一個月，這場走向終局的無聲之戰大致底定，是由兩個不同概念交織：主線是中美新舊霸權對撞，是修昔底德情境中不義的伯羅奔尼薩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但可能改變不義之戰的本質，是港台回應中國因素的支線——希羅多德情境中帝國大軍壓境之時，弱小民族捍衛自由而戰的波希戰爭（The Persian War）。

「伯羅奔尼薩戰爭所明顯指出的一件人們必須認識清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太大的權力將為自身帶來毀滅。雅典建立帝國的大業，最後結束於毀滅。她所興建的富強帝國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權力政治成功的範例。然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她的濫用權力終於導致她的衰敗覆亡。」

「希羅多德是紀錄希臘人為爭取自由而打敗強大的波斯那一次光榮的戰爭之史家。他們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是捍衛自由、反抗暴君及其由奴隸組成的軍隊之自由人。希羅多德親眼看到這場爭鬥。當時的口號是自由，所下的賭注則是希臘的自由獨立或奴役。而事實上，光憑這場戰爭的問題關鍵，已足以保證希臘人絕不致淪為奴隸。」

——Edith Hamilton，《希臘之道 The Greek Way》

如果我是一百年後撰寫中美對抗的史家，我會選為寓意深遠的開篇，不是2020年初在武漢爆發的百年疫情，不是528習近平按下綠色同意鍵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也不是529川普（Donald Trump）在玫瑰園宣布制裁中國的演說，而是520、521、522三天，台北、香港、華盛頓、北京，平靜和暴烈的真實時刻

(moment of truth)。

520，台北賓館灰白的巴洛克建築，這個日治時期總督官邸佈置了紫綠主視覺，巧妙的融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場低調而精緻，簡樸又現代的總統就職典禮，象徵中華民國台灣的新美學。這可能是台灣民主史上最受到世界祝福的時刻，蔡英文演講前播放邦交國及各國政要的祝賀影片，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得到史無前例的國際關注和認可，防疫成功讓共同體意識更鞏固，台灣社會的亡國感一掃而空充滿明亮情緒。

521，下午三點五十分北京突然白晝如夜、閃電暴雨，四點港媒傳出消息，召開兩會的北京要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通過港版國安法作為基本法附件，晚上九點人大記者會召開正式確認，香港命運在不尋常的異象中一錘定音。同一天，白宮發布長達20頁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方針》，正式定調過去四十年對中戰略失敗，將全面圍堵中國擴張。

522，北京兩會的對台報告，沒有九二共識，只有統一不見和平。這是中共在1979年元旦發出《告台灣同胞書》，終止對金馬長達20年單打雙不打的轟炸、確定和平統一方針的40年後，對台思維的重要轉折。

香港成了第一張骨牌，應聲倒下的連鎖效應是國際奔相走告，提防中國擴張的野心，圍堵態勢形成，28日中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29日川普宣布制裁中國，中美關係從戰略競爭進入對抗年代。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為了13億市場，發展出「以介入改變中國」的論述正式破產。中美雙方驅逐記者、美國驅逐有解放軍背景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各種經濟、科技、學術脫鉤措施，派對已經結束。

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一度讓世界暫停，卻讓中美矛盾加劇，北京對香港的這步棋，也預留武統台灣的伏筆，處於中國及西方意識形態斷層帶的香港和台灣成了前線，學者吳介民提出新冷戰的東方柏林（註1）——香港是極權前線的東柏林，而台灣則是民主前線的西柏林。

2019年609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開啟了港人長達半年史詩般的反送中抗爭，面對實力懸殊的中共，be water的香港抗爭者，發展出弱小者的自殺戰略已經自我預言實現。一年後攪炒成真，香港垂死前發出尖銳的鳴叫，就像刺鳥一樣，震動了世界。

中美港台走向終局，但是誰的終局？

然而，要理解這三天，以及這三天將帶我們走向什麼未來，便要先清楚現在美中港台身處的歷史階段。

這個發展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參與者和塑造者，美中台港四條支線在二戰後各自發展、逐漸趨近，現在正式交會。

若以國際關係角度，2008年北京奧運的大國崛起，為2013年習近平接班鋪墊，現在的世界格局便已隱隱浮現。習近平這位紅二代，父親是80年代中共最開明的元老之一、鄧小平、趙紫陽的改革開放最堅定的支持者習仲勳。習近平一度被中國自由派期待是中國的蔣經國，然而，過去韜光養晦的習成了各派系皆可接受的共主而出線，卻是懷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除了以打貪將過去派系共治的權力收束一身，積極發展一帶一路論述，將中國影響力從陸路推向中亞到歐洲，海路從東南海對南海，為中美爭霸的今日留下伏筆。

中港台關係也在同時期質變。2008年馬英九上任後，以ECFA大開兩岸大門，中國因素開始進入台灣視野，公民社會從2008野草莓運動醞釀，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強而有力的回應，讓兩岸大交流時代劃下句點。中港矛盾因2003年開始的CEPA大交流而累積，香港本土認同萌芽，2014年跟北京爭取實現雙普選承諾的佔領中環運動，因受太陽花佔領立法院影響，意外發展成長達79天的雨傘運動，之後中港關係失速墜落，但也為5年後的反送中運動鋪墊抗爭經驗和社會基礎。

而最關鍵的是中美關係因川普意外轉折。2016年拒絕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上任，兩岸關係進入可預期的冷和階段，但半年後川普趁歐美反建制浪潮當選美國總統，川蔡通話讓美中台關係起了化學作用。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沒有指定接班人，隔年三月人大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歐美開始警覺習近平野心，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打。

最後一根稻草是去（2019）年港府精心設計，藉由一起港人在台殺人事件而趁機推動的逃犯條例，所引發巨大的蝴蝶效應，不但衝擊今（2020）年年初台灣大選結果，更讓北京在一年後決意碾壓香港，進而確立中美對抗局面。

「修昔底德情境」的兩條大歷史線索：中國百年屈辱及冷戰遺緒

「香港危機」打開了西方焦慮多時的潘朵拉盒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由美國國關大師艾利森（Graham Allison）借用修昔底

德的偉大著作提出的概念，將中美矛盾定調為兩大強權的鬥爭，和當年雅典挑戰斯巴達的新舊霸權矛盾類似。而伯羅奔尼薩戰爭的結局是，注定一戰的兩個強權兩敗俱傷，最終被波斯帝國征服、希臘文明覆亡。

外界定義這是「新冷戰」，事實上，近兩年中美從輿論、法律、科技、貿易、特工等層面，早已進入攻防激烈的無聲之戰。而「香港危機」再加上「百年疫情」，將中美矛盾升級到熱戰邊緣。

但只看近因很容易墮入現實政治的實力猜度，遠因有助於我們更清晰這個格局的本質。歷史之業（karma）需要解決，否則難以進入新局，中美走向對決是匯流了幾個未處理的歷史遺緒，可能到了再也無法迴避、必須面對的時刻。

目前的格局，大致上由兩條歷史大線索和三個在地脈絡交集而成。

大歷史線索是中國百年屈辱和冷戰，中共同時繼承了大清帝國崩潰過程的民族屈辱，和蘇聯從共產國際的極盛走向解體的失敗教訓。三個在地脈絡則是1949國共內戰後，中港台各自發展70年的政治社會演變——中國的極權化和台港的本土化及民主化。再加上歐美近年反建制及反全球化浪潮，最終匯聚成「無聲之戰」。

其中最根本的歷史遺緒，是古老中華帝國的百年屈辱。19世紀末大清帝國崩潰前被列強割據，而後新中國建立過程依舊內外苦難交迫，這個古老民族的巨大創傷從未被治癒，也因此，在國共鬥爭中取得勝利的中共建政後，先韜光養晦，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走向擴張之路。

再者是歷史尚未終結。冷戰的起源是二戰時蘇聯和西方結盟對抗納粹德國，但後期產生摩擦，1945年蘇聯紅軍佔領柏林，希特勒自殺納粹德國投降，歐洲戰事結束。第一次柏林危機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共同戰略，為了分散美國對蔣介石援助的行動（註2），1948年蘇聯封鎖西柏林而有第二次柏林危機。西方靠空投救援成功後，1949年5月將德國分為東西德和東西柏林。

也因此，美蘇對決的冷戰雖然以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1991蘇聯解體告終，但繼承了列寧式黨國體制的中國，因改革開放、加入WTO而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比當年的蘇聯更富強。另一方面，習近平十分警惕蘇聯崩潰教訓（註3），接班後更加中央集權，而面對自由陣營的價值高地，中共則更加強意識形態宣傳，對外滲透破壞民主體制以削弱其正當性。

崛起的中國，需要和西方真正的「和解」和「清創」，遺憾的是中共建政後，在

意識形態清洗、經濟科技高速發展和民族復興使命的混合結果，並非走向與世界共榮之路，而是為了保護紅色政權，以及滿足國內外「中國人/華人 Chinese」的民族自尊心，展現霸權以減緩揮之不去的恥辱感。

對美國來說，無法接受新霸權被挑戰的現實政治邏輯簡單易懂，但中國對美國的心理複雜得多。雖說中美之間歷史上並無真正仇恨，甚至美國是讓中國進入世界體系的關鍵，但中國對美國投射的是西方列強當年對積弱中國的欺壓，無論是制度鬥爭或台港的核心利益，都可以輕易踩到民族自尊心。

也因此，中美矛盾可用實力原則理性評估的強權地緣角力，但也是古老帝國需要被解決的創傷導致的東西文明衝突，非理性的成分很大，恐怕比冷戰時美蘇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較勁更為難解。

「希羅多德情境」的三個在地脈絡：中港台未完成的1949命題

但除了歷史大線索外，後1949的台港邊陲，經過本土化及民主化洗禮，也發展出能左右大局的支線。台港處境更類似希羅多德筆下，雅典人為了捍衛自由奮戰，對抗波斯帝國大軍壓境的歷史。

1949除了確立東西柏林的冷戰前線格局外，也是國共內戰的勝負底定，導致中港台三地各自發展70年的關鍵年份。

當年4月中共解放軍渡過長江，蔣介石敗局已定，國民政府撤台，10月在金門短短3天慘烈的古寧頭戰役，打斷了毛澤東解放台灣的一鼓作氣，緊接著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進入東亞讓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得以喘息生根。

1949年末，國共內戰尾聲，南方各省都已被解放，五萬解放軍打到羅湖，已做好度過深圳河解放香港的準備，而英國駐軍只有1萬，但中共中央卻下令不過河維持現狀。周恩來的名言：「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成了中共70年來對港政策的方針。

也就是說，1949年中港台命運一度可能合流，卻因中共的權宜之計（註4）各自發展。對北京來說，當年保留實力，延宕70年的問題來到可以解決的時刻，但沒料到的是，台港主流社會從想统一到希望維持現狀，又在和中國互動過程中產生質變，人心背離，讓這個歷史時刻更加複雜。

台灣本島居民在200萬中國難民的文化衝擊，和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下，產生了推

動民主化的本土意識。但同時，中華民國政權也讓台灣不同於香港的孤兒命運，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前，可以上國際談判桌和列強平起平坐，1949年以前在中國從沒真正穩定的中華民國安定了下來，和台灣社會在作用力及反作用力下發生質變。1979年是轉折點，美中建交、中共確立和平統一方針、美麗島事件在國際和社會壓力下，為台灣打開漫長卻痛苦的新局，但也是學者吳乃德所稱，台灣民族精神上最飽滿動人的「台灣最好的時刻」（註5）。台灣人花了50年完成寧靜革命，共同體意識在今年大選大致完成。

1949命題對中國與台灣來說，都屬於未完成式，但中華民國在台灣因經歷了民主化，蛻變成富有活力的民主體制及公民社會。族群從矛盾、仇恨到逐漸共融，七十年的絕望掙扎相較現在的小確幸，若非其中一份子很難深刻體會。也因此，當中國和台灣對1949命題的答案不同時，台灣社會自然為了保護好不容易長出的主體性和自由的果實，而產生「抗中意識」。

香港的本土化和民主化又是另一個故事。香港從純商業不管政治的自由港，因回歸意外讓民主意識萌芽，再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並在去年反送中運動徹底轉化為爭取公義和自由的象徵，學者吳叡人提出的防衛型「香港民族主義」正式誕生（註6）。台港各自長出不可逆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意識，讓北京管治香港的成本大幅提高，而要收回台灣幾乎只剩武統選項。

若客觀分析台港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起初是回應內部問題，隨後是捍衛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不具擴張性。因此目前的對抗局面，事實上是港台邊陲及原霸權美國，對古老中華帝國亟欲「打破現狀」的被動回應。於是兩核心與兩邊陲的雙重矛盾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朝我們撲面而來的大時代。

面對今日中國，西方自由主義者有什麼道德責任？

若台灣是位於地緣政治斷層帶上、民主陣營前線的西柏林，那我們必須知道所處陣營如何看待美中爭霸——西方自由派尚未認清，今日中國是其不可推卸的歷史之業及道德責任，而台灣也有無法迴避的「1949 未完成命題」。

庚子年初在武漢爆發、蔓延全球的百年疫情，徹底改變了承平已久的後冷戰世界，也加劇了原有的矛盾：階級、種族、世代、文明。

北京為卸責而發動的戰狼外交，讓中美矛盾白熱化，西方再度熱烈論辯對中脫鉤與否。中國近年在世界到處插旗，除了在南海及邊界擴張軍備、掌握國際組織，藉由一帶一路擴張影響力到中亞、東南亞、中南美、非洲，甚至南太平洋，再加上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西方主流自由派基於人權的道德責任譴責中國不遺餘力，批評川普（Donald Trump）對中制裁方案空洞，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右派在妖魔化中國（註 7），擔心加速的中美脫鉤政策會導致戰爭。

體現此心態最常見的比喻是，30 年代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所採取石油禁運措施，和隨後的經濟脫鉤政策，逼使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讓美國捲入二戰。這類把美國脫鉤政策而非日本軍國主義解釋成戰爭之因，將防衛者面對擴張者威脅的回應視為挑釁的邏輯（註 8），其中以近日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接受 BBC 專訪最典型（註 9）。

二戰結束後各國需要休養生息，美國外交圈發展出「圍堵蘇聯」的冷戰策略奏效，但今日中國非昔日蘇聯，西方自由派菁英卻沒能跳脫傳統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論述——2018 年 95 歲季辛吉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中國崛起是歷史必然，衰敗中的美國應給中國崛起空間，中美需要維持權力平衡而非對抗，美國應與中國共治世界、共享利益。

這類主張既道德正確也合乎美國利益，但同時，西方自由派也不得不面對中國對港台的帝國慾望。這使得「台灣問題」成了燙手山芋，讓西方自由主義者陷入與巨龍共處或世界大戰的囚徒困境。

因西方自由派一路壯大的中國共產黨

雖然棄台論目前沒有市場，但把北京不可能退讓的核心利益「台灣」，看作會讓中美關係失控的危險引信，讓美國捲入戰事，一直是美國自由派菁英的潛在焦慮（註 10）。

然而追本溯源，讓中美走到今日對抗局面的，並非台灣也不是香港。

從中國共產黨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從 1919 中共建黨到兩次國共合作、1949 年國共鬥爭勝出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70 年代成功擠下中華民國被聯合國及美國承認、2000 年納入世貿體系成為世界工廠，百年來中國一步步長成超級極權國家，讓港台乃至全世界都籠罩在陰影之下，西方自由派一路都扮演重要角色，迴避不了最主要的道德責任。

20 年代受左翼思潮影響的西方知識份子，嚮往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想，再加上國共鬥爭時國民黨貪腐民不聊生，中共統戰宗師周恩來能秀善舞的魅力外交，比蔣介石和蔣宋美齡更成功擄獲西方的心。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夫婦曾到重慶秘密會晤毛澤東和周恩來，美國記者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斯諾（Edgar Snow）和中共關係密切（註 11）。斯諾作為第一個到延安採訪毛澤東的西方記者，於 1937 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浪漫化紅軍長征，深深影響西方對國共鬥爭的判斷，讓備受同情的中共得到道德高地的話語權，最終取得江山。

60 年代，許多歐美知識份子帶著對馬克思主義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浪漫想像，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毛派」，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便是代表，1968 年在歐美引起浪潮的「六八學運」和中國的文革相互呼應，歐洲對於共產中國的好感勝過美帝延續至今。

70 年代季辛吉主導「聯中抗俄」的全面親中政策，最終導致美國幾乎拋棄台灣（註 12），於 1979 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因台美人在國會的努力遊說，才留下《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但真正讓中共挺過危機、以靈活強韌的學習曲線，進化成科技極權強國的重要轉折，是「後天安門時代」西方自由主義者信仰的全球化理論。

1989 年六四鄧小平下令軍隊血洗天安門震驚國際，西方一度制裁中國外資撤離，北京靠台商、港商和東南亞華商的「鮭魚返鄉」才撐過危機，美國國內對中政策有長達十年的辯論。但 13 億人口市場的誘惑，讓 2000 年柯林頓（Bill Clinton）為首的華爾街熊貓派，極力運作讓參眾議院通過用《2000 年美中關係法》（The U.S.–China Relations Act of 2000）（註 13），規定中國加入 WTO 美國就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也是今日中美利益結構難分難捨的源頭。

北京統戰術：和西方自由派做朋友以爭取「戰略機遇」

從香港危機後歐美知識份子的失語可見，西方自由派一路對中共的判斷誤區，和西方本身很強的反思傳統有關。

過去歐美知識份子因地緣、思潮和文化親近性，對蘇聯的共產體制有較深刻的研究和理解，神秘的中華帝國對有文化語言隔閡的西方來說，歷史太悠久量體太大太複雜，理解如瞎子摸象。由於對「他者」的古老東方帝國認識淺薄，和

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慣性道德批判，便在這波洶湧巨濤中喪失基本判斷力。

另一種中國通則是基於傾慕之情，戴上玫瑰色眼鏡看待中華文化，他們雖對中國亦有批判，但多半對台港事務的不了解也不關心，在衡量中美關係時只有大國中心而不具邊陲視野。再加上不少中國研究單位或智庫接受中國資助（註 14），判斷比不熟悉中國沒有直接利益、偏戰略思維的情報人員或軍人更失準。

而生命經驗不同，西方駐中記者對中國的判斷和態度也有世代差異。中生代知名知中派如何偉（Peter Hessler）、張彥（Ian Johnson）或歐逸文（Owen Osnos）等在後天安門時代來到中國，參與了蒸蒸日上的「美好年代」，當年的中國人民質樸、公民社會有空間，他們的中國報導主要偏向軟性的社會文化議題，對北京的批判溫和不觸及敏感國安底線，而成為「了解中國的西方朋友」。

相較之下，2008年北京奧運後才到中國的新生代西方記者，直接經歷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北京收緊控制急速惡化的政治環境，會讓他們觸碰更敏感的國安議題而成了「中國的敵人」，對中國判斷也和中生代也有差距。曾是駐京記者、離開中國後決定回美國從軍、現任的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便是代表。

也因此，雖然主流輿論認為，抗中是美國結構性必然的跨黨派共識，不管誰執政都不會改變大方向，但在方法上，由於經驗與判斷不同，保守派和自由派對於「中美脫鉤與否」，依舊存有很大歧見。

而善於「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統戰術的北京，顯然有其偏好。

近日中國體制內學者為文直白分析，中國必將戰勝美國但須爭取「戰略機遇」的時間，他主張目前兩害相權取其輕是必須和美國自由派做朋友——因為雖說左派文人、思想家、自由主義者期望中國民主的心態，也是基於不尊重中國文明的傲慢，但戰略軍事思維的反共右派更危害中國利益。（註 15）

由此可見，西方除了少數知台派外，主流知中派焦慮台灣是「中美衝突」的危險引信，卻無視過去毫無約束力的「溫和建設性批判」是中國夢寐以求的「戰略機遇」。也渾然不覺已被北京摸透，並利用其誤判，以延後中美對決時間來換取最終稱霸世界的空間。（註 16）

失去創造力和理想性的西方思想界

正因為中國與美國的鬥爭，不只是單純的權力鬥爭，還是牽涉東西文明的意識形態矛盾，現代和前現代、自由資本主義和重商民族主義等複雜對抗，需要更深刻的分析來尋求解方。

但冷戰結束後 30 年，西方老牌民主國家處於安逸狀態，因制度老化弊病重生而不自信。歐美知識份子對體制的批判已少有新意，面對近年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政治浪潮少見深刻的結構性反思，只將自由主義秩序崩解歸咎於少數右派政客煽動民粹和孤立主義。西方精神世界已失去創造力和理想性。

相較北京有「民族偉大復興」的崇高正當性，能輕易又強力召喚古老帝國子民深層的內在情感，西方自由派只用權力邏輯的「修昔底德陷阱」來詮釋中美對抗，在信仰上就已對「批判權力」的進步陣營失去道德說服力，無法轉化為理念之戰，先天已輸了話語權。

而美國意外點燃的黑人命貴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因科技傳播的加乘效應（註 17），和川普政府的不當處理而火上加油，甚至延燒到歐洲，再加上疫情和選舉，美國國內幾乎處於準內戰的高度分化狀態；中國則藉由疫情無縫接軌限制人民行動自由、配給制度的準戰時狀態。美中對決在短期內的社會條件，民主的美國相較集權的中國居於下風。

終須一戰？ 尚未經過考驗的台灣認同

梳理完歷史因果，看到此刻無聲之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心靈比國力先衰敗、社會分崩離析的美國，對上制度自信而集權的中國，關於中美是否終須一戰？中國是否會武統台灣？似乎已不值得花時間去揣度。

同為庚子年的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大清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割讓的香港，以及 1895 年甲午戰爭割讓的台灣，便是百年屈辱的遺留，台灣是帝國完整的最後一塊拼圖，也是帝國自我認知的創傷療癒點。

對北京來說，香港已於 1997 年從英國收回，現在只需碾壓，隔著海峽的台灣，因國共內戰後的中華民國政體，加上美國第一島鏈的地緣戰略而更為複雜。但 70 年來，中國對台邏輯清晰一致，兩岸要和平從來就只有「統一」的選項，維持現狀的小確幸只是北京儲備實力的緩兵之計。

過去在中美夾縫中求生的台灣，面對中美對抗新局，還是習慣站在大國中心凝視自己的處境——覺得自己是兩隻大象打架的受害者、被美國利用的棋子，熱

衷比較中美實力來選邊。但無論是親中、親美，或幻想歲月靜好而不選邊的對沖思維，都是陷入大國政治的隨扈邏輯，命運自然只能由他人擺佈。

如果台灣把自己必須面對的「1949 未完成命題」放進中美爭霸的邏輯，那麼很大可能是場輸局——和上個世紀的冷戰相比，西方面對中國，心理上已沒有面對蘇聯喊出「歷史終結」的自信與豪氣。

於是我們真正該問的是，為了捍衛我城，香港人已迎向歷史命運，而同屬「希羅多德情境」的邊陲支線，台灣人是否也有同樣覺悟和準備？

面對中美核心的無聲之戰，台港邊陲可能改變地緣宿命嗎？

回歸第 23 年前夕，香港人正式迎向歷史命運，台灣人卻還未看清自己的歷史責任。台港必須共同承擔起世界的樞紐（pivot）角色，不只是地緣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用希羅多德情境介入大局，來扭轉修昔底德陷阱，是邊陲者唯一可能改變宿命的機會。

「我們確實有權期待奇蹟出現。不是因為我們迷信奇蹟，不是因為不管有意或無意，而是人只要能行動，都有能力達成不可能、不可預測之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政治的承諾》

2020 年 1 月 11 日，蔡英文勝選之夜演講，背後一字排開的執政團隊和新科立委，台下各就各位的基層黨工，顯示乘載台灣本土力量的民進黨世代梯隊已經完整——總統以 817 萬的歷史高票連任、國會過半二度全面執政，台灣人的百年民主追求歷經苦難來到收成時刻。

黨外時期從街頭與地方選舉起家，民進黨人才在選舉技術和政治行銷的成熟度，已遠遠將國民黨拋在後頭。但精於選舉術不代表會治理，台灣的民主實踐應往下一個階段邁進，民進黨在領導管理、體制運作、權力分配、凝聚國家共識的「善治」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卻也因國民黨全面崩潰，沒有足以制衡的在

野黨，而有「權力傲慢」的危險。

本土力量已大致完成中華民國台灣共同體的建構，但學者吳乃德提醒「台灣民族還沒經過真正考驗」（註 18）。疫情是一次測試，台灣因防疫成功成為國際焦點，和香港有著天堂地獄的差別際遇，卻還未意識到從邊緣到重返棋局需要付出代價。

面對「無聲之戰」歷史新局「全民防意識」必須建立

香港危機讓世界進入大歷史的新格局，台灣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國際圍堵趨勢漸明，但若制裁也無法將帝國慾望停損在香港，下一個危機就是台灣。

選後亡國感大減，防疫和罷韓成功的台灣主流社會沉浸在小確幸，台灣人對香港只有同情，不知覺自己是身處暴風眼才暫得平靜，無論政府或民間的憂患意識都不足，欠缺面對「終須一戰」的心理素質。

民進黨過去的人才培養主要在選舉、組織和地方治理，面對充滿變數的歷史新局雖有認識也有警覺（註 19），但對國家戰略走向缺乏膽識和想像力，目前執政團隊在國安、資安、國防外交等領域的人才庫、經驗、視野，甚至是心態（註 20、21），還不足以帶領台灣面對即將到來的嚴峻挑戰。

然而，台灣目前真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全民防意識」。這並非取決於美國總統是誰、兩黨是否抗中、美方軍售數量或國軍防禦能力，而是台灣社會面對「終須一戰」的知識儲備、意志和心理素質。

我們從香港的血淚經驗看到，港人經過去年長達 5 個月的實戰，一年醞釀「攪炒」，面對來勢洶洶的《港區國安法》，雖有國際強力支持，還是對香港社會造成實質的震懾效果。但港人去（2019）年也因長期運動長出星火燎原的「全民抗爭意識」，及黃色經濟圈等社會支持網絡，北京強力碾壓反而讓人心更緊密。

反觀台灣處境，雖然擁有科技戰核心的台積電和第一島鏈中心的戰略地位，但台灣不像高度國際化的香港，西方在港持份太多（本國公民和資金）很難放棄。近日雖有分析警告中共武力犯台可能，但面對台海緊張局勢升高，未見西方主流輿論呼籲保衛台灣是不可迴避的責任——主張對中國外交斡旋的自由派態度曖昧，即使友台的對中鷹派（註 22）也對台灣長期的國防政策如縮減軍備、取消徵兵制感到不解與疑慮。

香港人已證明，為了捍衛我城的自我犧牲，和不畏一戰的意志，才可能引發讓國際社會震動、共同行動的巨大能量，可見天助自助者，國際支持將取決於台灣人自我防衛的決心（註 23）。

中國因素的民防意識是抗疫成功關鍵

然而無聲之戰不一定是傳統戰爭，中共「超限戰」的思路是一切可以讓民心崩潰、迅速拿下台灣的方式，從癱瘓電力、電信、網路、金融系統到生化戰都有可能，「全民民防」不一定是軍事，重點是「民防意識」。

這次台灣的成功防疫經驗可知，從初期警覺 SARS 重演的危機意識、民眾支持禁止口罩出口、不輕易開放邊界、願意讓渡隱私配合居家防疫，到配合指揮中心的口罩配給制.....除了政府即時靈活、公開透明的應對外，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民防意識」，是讓官民緊密合作，使民主防疫體系順暢運作的關鍵。

事實上，台灣公民社會已建制了民防系統，然而這並非疫情發生時才建立，也非政治部門能夠主導，而是超過十年的公民社會累積——2008 年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開始，幾個重要社會運動如 2012 年反媒體壟斷、2014 太陽花，以及民間活絡的公民座談等長期教育，才慢慢成為大眾意識。

2018 年 1124 大選的韓流「輿論戰」震撼，讓台灣公民社會選後自主動員，有機生長出各式素人組織、網路群組等平台，迅速建立「反統戰」「反資訊戰」的識別、教育和防衛機制。經過 2019 年的議題發酵和實戰回應，2020 年大選看到成效，並在過年後爆發的武漢疫情發揮作用——選後原有機制持續運作，除了打假訊息，也將正確的防疫政策快速傳播到政府難以觸及的民間角落。

中國因素帶來的「亡國感」讓台灣公民社會多年來維持動能不墜，有足夠主體性和自信，願意信任政府和賦權，一起將等同作戰的防疫打得漂亮。相較之下，近年西方媒體雖對中國銳實力的討論不少，政治及知識菁英對中國也不信任，但還是缺乏實務經驗輕信中國和 WHO 提供的疫情訊息，再加上安逸已久的歐美公民社會過去毫無知識儲備（至今還不大願意戴口罩）和危機意識，於是官民信任和醫療系統一起崩潰。

從近日美國黑人命貴（Black Life Matters）運動看出，疫情讓民心潰堤在先，意外再加上政治和科技因素的助燃效果，出現暴動及趁火打劫和的變調，可見防衛意識在全民心理佈建的重要性。

台港邊陲者的樞紐角色

這場兩個核心與兩個邊陲的無聲之戰正走向終局，但是誰的終局還未知數。

我們不能迴避的現實是，疫情後更加集權的中國遇上分崩離析的西方，民主陣營的情況並不樂觀，但不代表港台只能被動接受結果。

正因為兩大「核心」面對的社會現實及結構利益，和兩小「邊陲」不盡相同，台港如果只隨核心邏輯起舞，就注定成為大國的棋子或棄子。1949 的歷史斷點讓台港命運差點交會，最後還是殊途同歸，兩地社會發展如同鏡像，面對巨變的新時代，台港才是深有共鳴、有共同願景的真正盟友。

於是，同處帝國邊陲的台灣人及香港人，在清楚地緣宿命的侷限同時，也要認知到自身的創造性，共同承擔世界樞紐的角色，不只是地緣上的，還是精神上、實踐上的一一香港人短時間內以驚人的進化和勇敢迎戰的精神，透過不懈的抗爭，喚醒西方曾為自由而戰的古老記憶。

而台灣經過資訊戰和防疫戰的操練，和長年面對「中國因素」的經驗，我們有責任以有創意的公民社會、良善的科技應用，和有想像力的政治治理，探索出兼具防衛能力和開放價值的民主典範轉移（註 24），為西方已呈現老態的民主體制注入活力和自信。

唯有改變扈從心態，一起成為前行者，讓共同信仰的國際成員追隨，台港才可能在國際現實的權力鬥爭中，以邊陲者精神來定義這場無聲之戰。將大國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扭轉為理念之戰的希羅多德情境，是台港擺脫地緣宿命的唯一機會，也是台港同盟最大的意義。

台灣必須幫助香港 但不侷限政治共同體想像

香港回歸 23 年的七一前夕，晚上 11 點《國安法》生效，台港已是命運共同體，台灣不能只有聲援香港、同情香港，而是必須幫助香港。

然而，在深思「台港同盟」的實質內涵之前，我們恐怕也要比過往更誠實面對彼此處境，從歷史汲取教訓。

80年代香港人主體意識還未成熟，中英談判時，欲從英國解殖的香港愛國青年，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捆綁一起，從此香港民主論述陷入「民主回歸」的主從邏輯。當年中港民主共同體的美好幻想，導致的今日困局，需由下一代的犧牲來打破。

從2014年雨傘運動的內部分化可以清楚看到，當時主導運動的香港泛民由於深受中國八九民運影響，對香港民主的想像是透過香港最終達成祖國民主化，而非鼓勵香港主體性。因而壓抑、嚴厲批判初冒起的本土認同，運動策略也因六四陰影而有諸多自我設限（註25），直到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年輕抗爭者的心靈徹底解放，才有長達半年的波瀾壯闊，「香港人認同」才算真正穩固，成了學者吳叡人認為「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唯一武器」（註26）。

如果我們探究台港兩地的深刻共鳴，都是被中心壓迫所長出的邊陲身份認同，以及對命運自主的渴望，和中港共同體的「民主回歸」本質不同，那麼台港同盟不應只有最直觀的政治共同體想像。台港同盟若要真正緊密，就應該理解彼此的現實，共同尋找出路，才是真正的價值同行者。

台灣人必須清楚「香港人」的真實結構。97回歸以後香港大開邊界，結構性的中國新移民沒有真正融入香港共同體，但造成資源排擠、貧富不均、樓價高漲等香港社會問題（註27），也是中港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從王立強間諜案牽連出的向心案可見，許多中資和中國移民用香港身份進到台灣，建立情報和社會網絡。去年一整年台灣民間反統戰不遺餘力，社會對於「紅色滲透」已經建立警覺，現在面對香港身份的結構大洞，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應謹慎以對。

另一方面，港人也需同理台灣的艱難。台灣和歐美國家不同，可能是全世界最不適合為香港制度性大開邊界的國家。除了越見凶險的兩岸關係，還牽涉到複雜的國家定位和憲法問題，制度性大開政治邊界更容易落北京口實，有攻擊台灣的藉口。

而港生在校園貼列儂牆被陸生撕毀、何韻詩和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被親中人士潑漆等事件，並非孤立個案，顯示台灣和香港一樣，社會內部有綿密的中國協力者和代理人網絡，國家安全會是首要考量。

台港有機共同體：理解彼此 共同尋找出路的價值同行者

而從台港的經驗看到，好的民主實踐需要明確的國家認同和邊界。政治共同體可以自由選擇，只要符合每個政治實體的規定（身份條件、投資、婚配、居留時間等），但成為社會共同體的條件更複雜，因為人／社會／文化是有機的，並非用「進步價值」要求，社會就要理所當然接納和共融，必然要經過「同化」及「融合」的過程。

如果放諸國際難民議題，無論是羅興亞、敘利亞難民的悲情，都可贏得巨大同情，讓一些政府被道德施壓接收，但長遠來看造成的社會問題和內部衝突成本卻很大。

香港身份在台灣邊境原本就享有《港澳條例》特殊待遇，在進入一國一制的時代，若要求台灣政府更開放邊界：放寬移民條件、制度性給政治難民身份，反而很容易增加台灣社會的疑慮，可能是最便宜行式的「支持香港」。而往往能自由選擇政治共同體的群體，是有流動能力的菁英，不是台灣人最同情的底層抗爭者。

另一方面，台灣經過 70 年才慢慢從不同族群的分歧認同，共融成中華民國台灣認同，凝聚共同體的過程如人飲水。台灣人認同面對此刻的歷史新局還是不夠穩固（註 28），現在大開邊界容納新的族群，恐會增加更多不穩定因素。

從香港社會依舊有共同價值（撐民主的黃絲），但身份認同不同（香港人 vs. 中國人）產生的矛盾可知（註 29），現實是身份認同對共同體凝聚力往往遠大於價值。而香港人此刻又需要更強的認同來度過黑暗，於是，一旦制度性開放邊界，必然會面對一定數量的香港移民在融入「台灣共同體」過程中，在資源分配、國家認同等核心利益衝突時被要求忠誠。

雖說台港關係沒有中港關係的矛盾，還是可能壓抑原生認同的主體性（註 30），造成兩地民間社會矛盾的風險。因此應避免用「進步價值」的政治正確慣性，急就章的要求台灣社會馬上接受對港開放政治邊界，重蹈中港矛盾覆轍。

反觀台灣經驗，過去幾十年訴求國際社會道德聲援承認台灣身份的悲情牌，特別是 2003 年 SARS 台灣國際孤兒，卻沒有這次疫情「Taiwan can help、Taiwan is helping」來得巨大能量——國際社會認為要跟台灣學習，必須將台灣納入國際組織——國際孤兒多年的台灣人自立自強，反而更為國際接納，這個心境轉變導致命運轉變的例子，值得香港人深思。

但這不代表台灣不能幫助香港，相反的，台灣必須要更開放社會邊界，台港共同體的精神，應該是有機的、文化的、社會的——台灣政府必須提供足夠的資

源救援、長期居留和安全照護，七一正式營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接手公民團體難以負荷的工作（註 31）；而台灣社會要更主動認識、持續關心香港，以社會安全網絡承接香港流亡者，幫助他們融入台灣生活。

如對銅鑼灣書店的支持，或對黃店、黃色經濟圈的支持。透過民間社會交流、思潮激盪、運動經驗分享，共同充實台港同盟的內涵。港人對台灣政府人道援助的期待，若不侷限在「取得身份」，而是「長期居留、避難照護」方向思考，或許可為台港社會的有機共同體取得空間，形成既獨立又扶持的關係，同為邊陲的樞紐角色更能靈活發揮。

結語：自由人的行動

無論如何，民主追求和社會發展猶如鏡像的台港，此刻只能照看彼此，在狂風暴雨中抱緊自由——香港欠缺經驗，可以從台灣的民主百年追求中理解，長夜漫漫永不放棄希望；台灣欠缺意志，今日香港是昨日台灣，提醒我們是先人犧牲才得以享受民主果實，不能在小確幸中繼續安逸。

是香港喚醒了世界，台灣要用實證為民主陣營指出新路，而在艱難時代的開端，漢娜鄂蘭的思想或能給我們一絲寬慰，那是她在《政治的承諾》裡提及關於「自由人的行動」：

「(節錄) 從一開始，自由就包含著冒險犯難的成分。因此只有那個自由的人隨時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冒險，而懷抱著不自由，奴性靈魂的人則緊緊抓住生命。

人本身有最驚人而神秘的天賦『行動』。行動獨特之處在於它啟動一個過程，而行動也標示某件事情的開端，啟動新的事物，掌握主動權。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新開始的事實。」#

註釋

註1：吳介民〈香港「柏林危機」下的台灣對策〉報導者；〈美中新冷戰中國在港築「柏林圍牆」，台灣會成為西柏林？〉新新聞

註2：根據蘇聯KGB情報高層Pavel Sudoplatov將軍在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蘇聯在1948年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

商出的戰略。當時也是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的時期。此舉是為了轉移美國對國共內戰的注意力，將美國牽制在歐洲，減少其對蔣介石的援助力道。

註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2012年12月南巡時，談到當年蘇聯崩潰感嘆：「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註4：根據中國《人民網》的中國共產黨新聞，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

註5：吳乃德《台灣最好的時刻：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

註6：吳叡人〈導讀香港：致一場未完的革命〉報導者。

註7：The Wire, Steve Bannon on Hong Kong, Covid-19, and the War with China Already Underway

註8：Foreign Policy, The Great Decoupling
The New Yorker, The Future of America's Contest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uld Donald Trump's War Against Huawei Trigger a Real War With China?Graham Allison

註9：BBC, US China cold war 'bigger global threat than virus'

註10：《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 Hardcover》Edward Luce
Taiwan Sentinel, The Liberals' Great Failure on Taiwan: A Response to Edward Luce
Michael Cole

註11：《在歷史現場：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李輝著

註12：〈汪浩觀點：季辛吉為什麼出賣臺灣？〉風傳媒

註 13：林怡廷，〈專訪李柱銘 捍衛一國兩制的最後騎士〉，報導者

註 14：〈六四 31 週年：美國退休外交官司徒文認為中國更加富裕，但並沒有真正改變〉

註 15、16：孟維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若改善中美關係，為何必須爭取美國左派？〉「我們正是利用了他們的錯誤，為自己的發展爭取了“機遇期”，減少了崛起的阻力。」

註 17：Reuters ,TikTok has its Arab Spring moment as teen activism overtakes dance moves

註 18：〈吳乃德專訪：台灣應展現保衛自己的決心，林宅血案真相不能只查檔案〉，報導者

註 19：〈北京推港版國安法 吳釗燮：下一步可能就是台灣〉，中央社

註 20：〈資安即國安淪陷五月天〉，知名資訊專業人士 TH Schee 整理今年五月台灣的重大資安事件。經濟部：國營企業中油遭致勒索病毒成功滲透和攻擊，至少將近有八千台感染；總統府：黑函／偽造／洩密事件；國會：立法委員遭致釣魚郵件攻擊；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數年前舊事重新見光（漢光演習扮演紅軍一案）；外交部：17 個駐外館處執行資安健檢，取得 19 個駭侵樣態；整體社會：2000 萬筆國民個人資料暗網流通一案；民眾個資疑遭外洩，行政院的回應是「內容很舊非政府流出」。

註 21：〈兩岸情勢緊繃 范疇民進黨中常會專案報告：台海 3 個月到 3 年內可能開戰〉，風傳媒

註 22：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新書《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 A White House Memoir）提及，川普對台軍售的態度不可信任，但台灣也一點沒有表現出好戰的姿態。波頓認為近年台灣大幅縮減軍力超過一半，是巨大的錯誤。

註 23：〈美國杜克大學民調〉兩岸若開戰 僅 23%台灣人願抵抗〉，風傳媒

註 24：How Civic Technology Can Help Stop a Pandemic : Taiwan's Initial Success Is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註 25：林怡廷，〈Umbrella Revolution：未完成的革命（上）〉、〈Umbrella Revolution：未完成的革命（下）〉，想想論論壇；林怡廷，〈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戰鬥〉，端傳媒

註 26：吳叡人，〈導讀香港：致一場未完的革命〉報導者

註 27：林怡廷〈【香港回歸 20 年】「港漂」的告白，誰是香港的未來？〉天下雜誌

註 28：〈迷霧裡吹來號角聲〉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反送中革命世代的認同問題，映照台灣現況〉，風傳媒

註 29、30：〈光榮冰室事件，遇上了怎樣的溝通困境？〉端傳媒；〈走進不招待普通話的餐廳：對話，痛苦與身份的掙扎〉，端傳媒；陳大文，〈在「家」、「國」之間的光榮冰室與社會學者〉

註 31：〈為香港而戰，卻回不了香港—反送中運動下無根的「旅行者」〉，報導者